

领导干部推荐读物

Global Money Strategy Struggle for Supremacy

这是一部世界货币战略史
也是全球经济格局演变史

货币霸权取决于大国的战略博弈，全球货币体系改革核心在于大国的竞争性制衡
中国的屈辱与崛起向世界证明：中国必须以全球战略思维制订并践行全球货币战略



全球货币战略

霸权博弈

方明◎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Global Money Strategy
Struggle for Supremacy

全球货币战略

霸权博弈

方明◎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货币战略:霸权博弈/方明著.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093-3982-4

I. ①全… II. ①方… III. ①货币政策-研究 IV. ①F8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6363 号

策划编辑 潘孝莉

封面设计 周黎明

全球货币战略:霸权博弈

QUANQIU HUOBI ZHANLUE; BAQUAN BOYI

著者/方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毫米 16

印张/25.5 字数/418千

版次/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3982-4

定价:65.0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邮政编码100031

传真:010-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010-66022958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66017726

邮购部电话:010-66033288

序一

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尚在，欧洲债务危机接踵而至。金融和经济形势的动荡再次激发了国际货币体系发生深刻的变革。出现了各种相关理论和主张，诸如超主权货币论、全球统一货币论、区域货币论、回归黄金本位论以及其他商品本位论等。但是，如何衡量各国货币战略的优劣，认清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利弊得失，仍然缺乏恰当的、历史的和完整的分析框架和判断依据。当前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关注越来越多，阴谋论似乎成了一种意识潮流，而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转型国家的货币战略选择，国际货币秩序的发展，深入研究的并不多，具有自身研究体系的也不多见。

方明同志《全球货币战略》上、下两书行将出版，来求序。他沿袭了此前出版的《蝶变：从金融风暴走向全球共治》一书汇率论的观点，充分强调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同时，他从战略的角度、以独特的分析框架和衡量标准，对世界各国货币战略的选择历史、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史及相关影响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当然，作者的出发点是中国在现阶段的切身利益。他认为，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地位的上升，中国未来的货币战略在于人民币国际化并逐步成为关键货币。另一方面，基于对全球社会化大生产与有效需求关系的理解和对市场经济竞争理论的理解，他还认为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键，因为这样才能限制以美元为核心的发达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利益同盟，才能限制国际货币的流动性过剩，才能限制对非发达国家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投机和掠夺，才能尽可能避免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爆发。

《全球货币战略：霸权博弈》围绕着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西方霸权兴起中金融霸权和国家货币战略的作用，以及英国、美国霸权的更迭，当前正处债务危机的西欧货币一体化战略及其弱点，日本依附美元的货币战略进行了

分析，表明了发达国家自身不同阶段货币战略的变化和作用，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性以及相互之间的依存共生关系，提出了国际竞争的核心在于国际货币实力和相应的国际资本实力的观点。《全球货币战略：大国崛起》对商品货币国家依附性的货币战略选择，俄国、前苏联、俄罗斯、独联体、经互会中东欧国家的货币战略选择，亚洲、拉美和非洲主要国家的货币战略选择，以及对中国货币战略历史的分析和崛起的原因，剖析了这些国家货币战略选择的后果、货币国际化的成败，说明既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束缚使这些国家处于跟随或夹缝中求生存的境地。作者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确的货币战略选择推进了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 GDP 规模、对外贸易规模和国际资本实力的上升，中国具有了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能力。因而，作者强调，中国要解决自身的问题，要成为有效制衡美国的力量，应该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促进全球大规模生产与财富分配不均和有效需求不足之均衡，制衡发达国家依靠信用创造的过度消费，制约全球过剩的流动性对全球商品价格和物价的冲击。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该书通过对全球几乎所有国家货币战略选择的历史后果结合相应的历史数据进行了颇具说服力的分析，首次从理论上论证了三个至关重要的结论：第一，全球化是一种大趋势，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化的支配力量，要解决全球化中的失衡和流动性过剩问题，必须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需要另一种关键货币以制衡美元。第二，中国的国际责任不在于货币升值，而在于人民币国际化并成为关键货币，这是中国内外部条件逐步成熟的主动选择，这对世界和中国同样重要。第三，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是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均衡而不是取代美元，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也并非对美国的取代，中国不会成为霸权国家。

作者还指出了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的条件，即中国需要树立全球经营观，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尤其要进一步推动内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

通过对全球货币战略史的回顾和研究，作者既指出了制约全球失衡的根本问题，也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重要意义时，更具体化为中国通过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而

成为关键货币国、融入全球化并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的战略方向，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多年从事全球金融研究工作，具有深邃的历史使命感和全球宏观视野，注重历史事实、数据和理论的结合，屡有创见。作者分析了全球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战略和兴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是作者继《蝶变：从金融风暴走向全球共治》一书后的又一力作，值得向有关管理者和广大读者推荐。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晏智杰

序二

—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有关货币金融史研究的专著。但与其他货币金融史的研究不同，它是从全球视角出发的国别史著作。在这一框架下，货币金融史不再是中性的纯自然主义的展示，而是与世界经济中的基本结构——发达与不发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平衡关系紧密相连。受制于这一结构，一部货币金融史充满着发达国家的春风得意和不发达国家的苦涩挣扎。受制于这一结构内在矛盾的运动，一部货币金融史也彰显着正在崛起国家的憧憬和没落国家的无奈。

用这种角度来研究货币金融史是有道理的。历史表明，现代货币制度与金融安排起源于地理大发现，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殖民活动，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的经济活动第一次被联系在一起，遥远的海外贸易加速了现代化金融业的成长，而日益深化的对外经济联系又需要国际货币制度的安排。其间金融业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演进时时处处伴随着大国经济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博弈。早年对贵金属的追逐，成就了西班牙的强盛，导致了欧洲的价格革命。随后海外贸易的发展，催生了“海上马车夫”，现代银行制度在荷兰萌生。而建立在海外殖民地基础上的“日不落帝国”，则出现了金融革命，这即是包括记账货币和货币制度安排的货币革命，也是包括国家信用确立和运行的财政革命。同时还是金融工具和金融体系以及投资组织形式的经济制度改革。英国的金融革命为随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当今世界金融货币制度安排的蓝本。欧洲各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引领着金融货币史的变迁，不断刷新金融版图，是领跑者和整合者，霸权博弈成为其特色。

全球货币战略： 霸权博弈

相形之下，其余世界则成为这一金融变迁和版图刷新的被动接受者。早年的世界经济是多线条发展的。但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发达国家对外扩张，后进国家被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一种单一的模式取代了多线条的发展可能。为追赶先进国家，后进国家不得不“师夷之长”，西方的一切成为竞相模仿的对象。与之相适应，源于西方的金融货币制度安排也落地于东方，由于是“舶来品”，不仅以“消化不良”为特征的金融发育水平低成为正常现象，而且受舶来品的支配，依附性的金融货币发展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时值今日，我们依然能追踪到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历史遗迹。拉丁美洲种植园，非洲的黑奴贸易，亚洲的殖民地，构成了这些国家“路径依赖”的初始条件，影响着其后金融货币制度的安排。对后进国家来讲，因依附而致的夹缝求存的战略成为其无奈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贯穿整个世界经济史的发达与不发达结构关系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基准出发点。即使在今天，世界经济体系依然是一个建立在南北差距上的经济体系并充分体现在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上。二次战后，殖民统治的崩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强制性的政治依附关系虽然退色了，然而无论从起初的关贸总协定到后来的 WTO 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体系，还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仍是以发达不发达为基础的。换言之，发达不发达仍是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本质，其中发达国家既确定了这一秩序的安排，又主导着这一秩序的运行。国际经济活动的规则，运作，乃至组成人员大多出自于发达国家，漠视发展中国家利益，深化南北差距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基本惯例。这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在内的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吁声不绝于耳，原因也源于此。

于是，霸权博弈和夹缝中求生存就成为世界货币金融史的真实写照，它凸现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各自处境以及相应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战略选择的约束下，金融货币制度安排及其变迁不再是温情脉脉的诱惑，也不再是冷冰冰的说教，而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厮杀，包含着血和肉。难怪有人把它概括为“货币战争”。我想，这也是作者把本书冠名于“全球货币战略”的初衷吧！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有了可能性。中国如能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当有助于其崛起。

二

历史是现实的投影，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以史为鉴”就是从历史中找出解读当今错综复杂世界的线索。但是，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当今的世界经济毕竟不是历史的自然延伸。

与过去相比，各国经济被更复杂更紧密的经济联系相互纠缠着。这种相互缠绕和包裹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出现了异化，日渐形成一个各国相互依存但却某种程度上超然于国家的独立的全球经济，即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与不发达各国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演变成为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而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性问题又使传统的发达不发达各国经济难以置身其外，独善其身。

眼下还在持续着的以去杠杆化为特征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结果。自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与以往全球化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扩展到全球。随着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市场经济原则通行于世界，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 WTO 开始确立。由于经济体制的一致化，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其结果出现了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又远快于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

二是工业化生产方式扩展到全球。随着贸易投资自由化，产业的布局已超越传统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的局限，而开始全球化。一个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为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要素并降低水平，国际服务外包、生产外包成为典型形式。与之相适应，跨国的供应链金融安排成为新的时尚。

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被整合为相互依存但又有所区别的三大板块：首先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将其廉价劳动力从而低成本的制造优势纳入到全球化中。为全球经济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拉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也成功地成为“世界工厂”，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其次是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包括俄罗斯、巴西等在内的资源出口经济体，将其资源优势纳入到全球化中。在亚洲制造业发展的带动下，这些经济体的资源出口数量增长，价格上升。它们在物质资源支持全球化的同时，也分享了全球

化的好处，其外汇收入也快速增长。第三是欧美发达经济体，将其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优势纳入到全球化中。它们在改善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为全球化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分享了全球化的好处。所以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些经济体不仅透支了自己的未来，而且也透支了别人的未来。

由于经济全球化，上述三个板块不仅相互依存，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一损俱损的紧密关系。亚洲新兴经济体和资源出口经济体的贸易顺差所形成的外汇收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源源不断投到欧美资本市场，形成了欧美资本账户的顺差。而欧美以资本账户顺差弥补了其经常账户逆差，支持了进口，进而形成其他板块的贸易顺差。由此，当今的世界经济被金融活动紧密地联结起来。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全球金融的一体化。

在这个被金融一体化的世界，从国别看是不平衡的，表现为其宏观经济外部的不均衡，不同经济体存在着经常项目巨额顺逆差。囿于这个角度，需要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但从整体看，世界经济又是平衡的，这一经济体经常项目的顺逆差恰是另一经济体国际收支顺逆差的平衡条件。理论上世界经济均衡增长是可以实现的，是不会出现目前这样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发生着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只意味着一件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却没有缔造出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必要的全球治理条件。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演进中的世界经济已开始迈向未来，而已然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拘泥于过去。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衍生出全球所共同面对的挑战，而陈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却茫然不知所措，断裂便由此而生。它既构成目前仍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也构成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和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动因。

基于对这一事实的了解并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作者在对全球性共治问题进行研究并有成果付梓出版之后，又将眼光投向历史，期望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找智慧，希求答案。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将作者已出版的《蝶变：从金融风暴走向全球共治》与本书联在一起阅读，就会明显体会到作者的上述用意和企图。我想，不论这种企图是否达到，答案是否合理，作者的用意和努力都是值得敬佩的。

三

历史有很多偶然性。但历史就是历史，它是通过偶然性来开辟道路的，偶然透出了必然。一部货币金融史虽然不时露出权谋的阴险，诡计的肮脏，但经过历史的沉淀，规律性运动便解开了面纱。

试以本书提到的两例为证，一是货币本位的变迁，二是中央银行制度的普及。

首先，货币本位制的变迁。银本位制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金属本位制。由于白银冶炼相对容易，适应了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社会的需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批发商业和大工业出现后的大宗商品交易的增多，白银因储量丰富而价值趋贬的缺陷便暴露了。特别是美洲的发现，白银大量输入，促使欧洲大宗商品交易以更贵的金属——黄金为交易货币。在此期间，虽不乏有西班牙征服者杀戮印第安人的暴行发生，但支配他们的却是白银和黄金的开采和冶炼的生产成本及其背后的经济规律。在金属本位制向信用本位制的漫长过渡中，同样肮脏事件也不断发生。传说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操控金融市场的故事，即是事实，也是发生在这样的经济规律下：一方面经济发展需要包括增加流通手段在内的货币供应的扩大，另一方面，货币供应又受制于黄金产量的增长，经济常陷入通货紧缩状态。为缓解这一矛盾，商品交易出现了延期支付的办法即赊销，而信用关系的发展为贵金属的符号，即银行券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流兴风作浪的历史背景。

其次，中央银行制度的普及。中央银行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英格兰银行曾是欧洲最大的私人兴办的商业银行，通过为英国公债提供利息担保和垫付资金，垄断着英国国库的料理。显然，这是非常盈利的生意，使人眼红，为争夺国库生意的阴谋诡计不断上演。但这也是有特别风险的生意，如果当其他一家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困难尚可同通过同业拆借予以缓解的话，而一旦多数商业银行同时陷入流动性困难时，这桩生意就会因垄断而招致灭顶之灾。事实上，十九世纪英国货币金融体系不断出现全面性的流动性危机，使英格兰银行时时处于惶恐之间。博弈的结果使英格兰银行成为最后贷款人，只同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发生往来，而不与工商企业和个人发生直接信用关系，成为银行的银行，并因此发挥了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中央银行制度由此诞生，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无论先进的发达国家还是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不约而

同地都接受了这一英式制度安排，使其成为国际规范。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其他史如此，货币金融史也是如此。上述两例表明，阴谋诡计尽管猖獗一时，但毕竟不会长久。也正是基于此，货币金融活动才不神秘，货币金融学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是对规律的总结，从而是可把握，可预测并可被证伪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发展中国家的受伤于金融危机统统归结为阴谋所致，也不能把发达国家对金融衍生品肇事的不负责任统统归结于失误。正确的态度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历史的进程中把握逻辑的进程。其实，在对各国货币金融发展的描述中，作者不经意闪现出的货币金融学的顽强逻辑，这便是对此最好的佐证。

诚然，正如作者所言，“此书内容庞大，纵古论今”。宏大叙事的一个缺憾就是细节分析的匮乏，时间的大跨度处理的难度是聚焦的不易。从这个角度上讲，本书仍略嫌粗糙，许多亮点戛然而止，不能力透纸背，留下了许多商榷的余地。据悉，作者还有后续的写作计划，相信在今后入木三分的刻画中，可以得到弥补。但无论怎样，本书仍瑕不掩瑜，掩卷后仍有长思之感。作为在中国银行一同工作的同事，我为有这样的同事感到骄傲！

是为序。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曹远征

前言



近代国家的兴起在金融，在于国际货币的获得及其金融体系对国际货币的创造能力（财政和货币在近代金融体系中尚未有严格的区分）。如果没有金融体系的良好支持，没有国际货币的把握和持续创造能力，英国和美国难以成就其霸权。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霸权的短暂，俄国和苏联霸权的兴起与衰落，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金融体系的发展，没有获得国际货币，没有恰当地应用和创造国际货币的能力，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成为真正的大国或者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也是不可能的。巴西、墨西哥、印度和过去的中国，似乎就是如此。如果一国内部金融革命完成，外部汇率机制能够有效地创造国际货币，加上自身的创新性生产体系和贸易体系的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可能成为现代化强国。日本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如果一国的汇率机制不能创造国际货币，没有完成内外综合性的金融革命和社会革命，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强国。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中国现在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

中国最终要走向世界，我们必须具备大国思维和全球思维，否则极有可能在短暂的辉煌面前迷失。现在谈货币战略，既是要解决现在中国可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可能在 10 年 20 年后挖掘殆尽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提出全球思维，是因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既不是单纯地依靠内需，也不是单纯地依靠外需，甚至不是内需和外需的简单相加或平衡，而是要走向全球经营，也就是把全球市场、全球资源、全球技术、全球人才、全球生产作为一个为我所用的整体来经营。全球经营，我们能应用的不仅是简单区分的国际国内市场，而是具体的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全球经营，要

求我们继续深入推动全球一体化发展，通过开发全球资源和市场，利用全球人才和技术，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二

东西方经济中心的转移既有戏剧性，也有必然性。因为，西方社会的金融革命为此奠定了基础，而在金融革命基础上的冒险精神和殖民精神，以及通过航海对全球贸易网络的掌握，伴随着武力的征服或获得的战争赔款，伴随着武力的贸易和投资，尤其是对金银国际货币的掠夺和利用，是东西方经济中心转移的必要条件。西欧诸国从多年对抗和战争中的兴起，以及政治体制的更新，为东西方经济中心的转移准备了政治条件。

英国以强大武力和英镑货币霸权为基础奠定了日不落帝国。美国通过战争投机从英国手中接过了货币霸权，但英国国际货币的获得和应用能力仍然紧追美国之后。美国在美元本位制下任意利用美元汇率政策达到自己的目的导致了全球一次次陷入金融危机之中。而西欧国家历史上货币统一的意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促成了欧洲汇率机制的形成，最终推动了欧元的诞生，但全球金融风暴后的欧洲债务危机证明，区域化共同货币似乎不能改变既有国际货币体系。日本作为一个后来者利用全盘西化和战争手段，以及融入国际货币体系的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成功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日元被迫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金融泡沫破裂，但日本政府明智的选择，使日本在美元本位制下仍然获得了较有利的国际货币地位。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大国的博弈及美元霸权体系下发达国家的货币战略。我们看到，除了GDP实力外，对外贸易规模和国际资本实力使这些国家都具备了独自或以区域经济体形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博弈的实力。这是《全球货币战略：霸权博弈》的内容。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传统的商品货币国，中东海合会国家属于新商品货币国，其对外仍然依赖于美元本位制和其商品出口，但货币受商品价格的影响较大，而商品深受美元价格的主导，因此其自主性较差，属于跟随性策略。俄国与日本的经历有一些类似，都采用了融入国际社会的货币战略，但苏联却背离了这一体系，以人为本的金本位制和经互会计划定价贸易机制建立了以卢布为贸易货币的区域经济体，但由于缺乏国际货币，只能以出口原材料、石油和黄金来换回购买医疗药品和食物的硬通货，并最终发生货币危机而破

产。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在东欧剧变和苏联剧变后，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开始了艰难的市场化转型之旅。它们追求的都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并积极融入国际货币体系之中。东欧大多数国家加入欧盟并确立了加入欧元区的货币战略。但是，在欧洲债务危机之后，一些东欧国家放缓了加入欧元区的步伐。欧元区的规模边界问题就提出来了。俄罗斯实现了卢布的可自由兑换，但是，以卢布为核心的独联体区域货币一体化仍然遥远。

印度和东亚国家货币制度的发展，汇率制度选择的历史，充分体现了从英镑本位制向美元本位制的过渡，东亚奇迹则充分体现了美元本位制的深刻影响。亚洲要真正摆脱美元本位制的影响，区域一体化发展是重要的基础，但不一定是区域货币一体化。因为，区域货币一体化如欧元区一样，不能摆脱其弱点。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联盟正在进行贸易一体化的尝试。而中东海合会试图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货币一体化。目前看来，这些国家属于新兴商品货币，但是，石油输出国对原油输出的依赖过大，成为稳定的货币区有一定的难度。

拉美独立以来，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货币制度，也经历了多次货币危机。这一切，既拜自身过度借贷之赐，也拜美国操纵美元汇率所赐。拉美美元化趋势和东亚美元本位制有些类似，但加勒比地区一体化和南美一体化有所发展，委内瑞拉等几个国家正在尝试区域内结算货币苏克雷，但可能难以有效抗衡美元。西非和非洲法郎区在欧元诞生后保持了与欧元的挂钩制度，而南非兰特区也有所发展，但建立区域货币可能尚需时日。

中国自明代以来融入以白银为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商品的出超，使中国长期保持了白银的入超。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下，加上罪恶的鸦片贸易以及清政府无力控制国外白银铸币和列强所发纸币的流通，使中国过早丧失了货币主权，国际货币大量外流，出现了银荒。经过民国初期的废两改元和1934年的法币制度改革，中国货币制度确立了信用货币之道。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内战的爆发，法币制度最终破产。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货币制度的发展，也为人民币和中国货币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想象空间。以共同货币区建设统一台湾地区，或许可作为一种战略选择，但是，这一战略选择的前提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并成为关键货币。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也是中国改革国际货币秩序，促进全球秩序更公平、更合理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货币战略选择中，出现了多次危机，有许多的无奈。实际上就是在大国博弈中的夹缝求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国际资本实力大幅上升，使中国具有了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实力。这也是中国崛起，成为强国的重要战略契机。这些是《全球货币战略：大国崛起》的内容。

三

这是作者继《蝶变：从金融风暴走向全球共治》一书后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成果。其实，作者想完成的是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研究，但在提出全球货币战略之前，对于全球货币战略的历史地位，货币霸权的转移和货币体系选择中的各国或区域地位的变化，从历史、数据的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拥有自己独立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很重要，美国操纵美元本位制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因此需要全球共治，这是《蝶变：从金融风暴走向全球共治》一书中完成的任务。国际货币体系很重要，它决定了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全球货币霸权的转移和巩固与主要国家霸权的兴衰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一国的兴亡也与一国货币战略的选择有着直接的关系；国家实力的大小不单以 GDP 决定，在全球一体化大趋势下，国家实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国际资本的获得与利用能力，以及对全球资源、经济金融命脉的控制能力；全球货币体系改革需要除美国外的另一个或两个关键货币国或关键货币区域，有着强大内需潜力的中国即是其一。相应地，一国国际资本实力的大小不仅仅看净资产大小，而同时要看其国际资产和国际负债的大小，更要看该国货币是否是国际货币，以及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拥有国际货币欧元的欧元区，当前的债务危机正向纵深发展。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较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欧洲福利社会导致了福利刚性，政府支出在全球金融风暴的衰退中仍然有增无减，一削减就出现大罢工。经济衰退导致财政收入下降，财政赤字规模日益扩大。伴随着经济总量的下降，财政问题日益突出），但赤字规模同样较大的美国、日本和英国并没有出现如此广泛的债务危机，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拥有货币自主权，而欧元区的国家将货币自主权全部交给了欧洲央行，而欧元区经济状况差异极大，不同国家对货币政策的需求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央行受制于法德大

国，难以如美英日的央行一样采取零利率政策和大规模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化解危机。同时，出现危机的国家的经常账户多为赤字，国际收支失衡，偿还外部债务的能力不强。此外，欧元区内部金融机构跨国持有债权非常普遍，规模也非常大，危机的传染性也就非常大。欧债危机和美英日债务压力给我们的长远启示有四点：一是共同货币区必须以一体化为基础；二是国际化货币必须保持健全的财政；三是一国央行必须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四是即使有国际货币创造权，也要限制在一定的规模内，要注重国际收支适度的动态平衡管理。

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发展或许不应以直接建设货币区为目标，而首先应立足自身，应以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国际资本实力为目标。当一体化达到50%以上的水平和国际资本实力达到一定水平时，货币区目标才具备了良好的基础，此时受到的阻力较小，否则只能是缘木求鱼。全球各国货币战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核心——依附体系，而不是区域的平等的同盟体系。

一般人潜意识里认为弱就需要同盟，从此思路出发提出了各种货币同盟或货币区的计划，却往往偏离了推动金融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有时反而弄巧成拙。拼凑起来的货币同盟事实上却非常脆弱，相当于曹操听庞统之计用铁链将船连接起来，结果是弱点放大，金融体系更为脆弱，在国际危机的冲击下崩溃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我们需要明白，任何货币战略的选择，任何货币联盟的组建，是为了解决制约发展的外部经济金融条件，寻求发展的动力，而不仅仅是为了货币同盟而货币同盟，或者简单地以为有了货币同盟就解决了一切，从此可以高枕无忧。

因此，中国的货币战略不在于建立亚洲货币区，甚至不在于大陆与港澳台的货币同盟或一体化，而在于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关键货币。在这一核心之中，港澳台与大陆的融合或一体化才有根基。更进一步地谈亚洲货币区，才有真正的核心。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就是成为与美元类似的具有世界货币特征的货币。这并不意味着取代美元霸权，而是为全球货币体系带来均衡，制约美元霸权的为所欲为。

中国应利用成为关键货币国之机进行全面和恰当的改革，奠定和稳固现代化强国的基石。若非如此，中国前路之艰，或非我们所能想象。历史最终会给出答案，但我们希望看到我们希望的答案。前车有鉴，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危机意识和大国战略。中国需要宏图大略，一切皆以中国强盛为根本宗旨，